

巴以冲突：根源、影响与出路

王林聪 李绍先 高祖贵 董秀成 查道炯 薛庆国 王宇

新一轮巴以冲突持续发酵，对地区乃至国际政治经济格局造成不同程度影响，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巴以冲突堪称“世纪冲突”，具有非常复杂的历史根源、宗教文化根源和现实根源。新一轮巴以冲突与十多年来恶性循环的多轮巴以冲突一样，都是中东和平进程长期脱轨、“两国方案”陷入困境的结果。新一轮冲突让巴以问题重回国际视野，成为国际政治议程的一部分。冲突对地区和解产生负面影响，不利于中东地区逐渐汇聚形成的缓和潮扩展；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较大冲击，打乱其中东战略部署；引发国际舆论战、认知战，加剧美欧等经济体内部分歧与社会撕裂。截至2023年年底，冲突对区域和全球经济以及能源市场产生的影响总体有限，对全球石油实际产能的影响较小，出口方、进口方都没有把石油“武器化”的资本，将石油“武器化”也较难成为巴以冲突中相关国家的首选项。现阶段，巴以冲突向周边的蔓延和外溢仍然有限，加沙人道主义危机以及如何治理加沙成为关注的焦点，切实落实“两国方案”才是解决巴以问题的根本出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中国始终站在和平、公道、国际法、大多数国家的共同愿望以及人类良知的一边，积极推动和平解决冲突。

关键词：新一轮巴以冲突 冲突根源 政治和经济影响 “两国方案” 中国立场

多视角观察新一轮巴以冲突

王林聪（中国中东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一）巴以冲突的根源

巴以冲突跌宕起伏、持续70多年，已成为“世纪难题”，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宗教文化根源和现实根源。

一是历史根源。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是制造巴以问题的祸根。1917年，英国发表《贝尔福宣言》，表示“赞成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家园”。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奥斯曼帝国的瓦解，英国通过国际联盟取得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权，并采取“扶犹排阿”政策。大批犹太人迁移至巴勒斯坦，致使阿犹矛盾激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美国逐渐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支柱，开始在中东地区取代英国，操纵联合国大会于1947年11月29日通过《巴勒斯坦将来治理（分治计划）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分治决议》）。《分治决议》规定，在巴勒斯坦地区成立一个阿拉伯国和一个犹太国，占总人口1/3的犹太人拥有巴勒斯坦56.5%的土地，而占总人口2/3的阿拉伯人拥有43%的土地，耶路撒冷为国际共管。《分治决议》遭到阿拉伯人的抵制和强烈反对。此后，随着英国委任统治结束，以色列国建立，阿拉伯国却一直未能建立，巴以之间的冲突接踵而至，巴以问题遂成“世纪难题”。

二是宗教文化根源。犹太人历史上经历了定居迦南（巴勒斯坦）时期、散居世界时期和重聚巴勒斯坦的建国时期。一直以来，犹太人拥有始终不渝的宗教信仰，坚信上帝是唯一的主宰、犹太人是上帝的“特选子民”、迦南是上帝赐给犹太人的“应许之地”。时至今日，“特选子民”和“应许之地”仍是许多以色列人根深蒂固的观念。与此同时，早在公元7世纪，巴勒斯坦就成为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是巴勒斯坦主体民族，世代生活在这里，并将耶路撒冷视为继麦加、麦地那之后的第三大圣地。于是，在耶路撒冷归属问题上，巴以双方都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主人。这种宗教虔诚和偏执成了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严重障碍。

三是现实根源。巴以问题交织着大国政治博弈、巴以政治对抗及其内部复杂的斗争。长期以来，美国偏袒以色列，成为巴以冲突延宕的推手。美国一直把保护以色列安全作为其中东战略的核心。一方面，犹太集团在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另一方面，美国扶植以色列，利用巴以争端插手中东事务，分化瓦解中东国家，遏制地区大国崛起，以达到其控制中东、维护其中东霸权的目的。近年来，美国推动大国战略竞争，为遏制和打击伊朗、叙利亚等反美力量，绕过巴勒斯坦问题，力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默许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与此同时，在经过三年半内的第五次选举后，以色列政坛强人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组建该国“最右翼政府”（由利库德集团、宗教政党沙斯

党和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党等右翼和极右翼政党组成)。此后，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 (Itamar Ben-Gvir) 多次进入位于耶路撒冷老城极具争议的圣殿山 (穆斯林称“尊贵禁地”)，被巴勒斯坦人和广大穆斯林视为公开挑衅。以色列政府在扩建犹太人定居点行动上更加激进，巴勒斯坦人处境持续恶化，陷入严重的生存危机。

(二) 新一轮巴以冲突的影响

1. 冲突对地区局势的影响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以下简称“哈马斯”) 选择在赎罪日战争 50 周年之际向以色列发起代号为“阿克萨洪水”的大规模突然袭击，是一次“绝境反击”，向外界表明巴勒斯坦问题不能忽视。然而，巴勒斯坦内部分裂严重，哈马斯与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 (以下简称“法塔赫”) 分庭抗礼。面对以色列对加沙的空前大规模报复行动，哈马斯虽然显示了惊人的抵抗力，但预料将难以继续执掌加沙地带。同时，随着以色列军事行动升级，加沙地带民众死伤惨重，已出现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新一轮冲突对以色列政治、经济和社会造成深远影响。哈马斯的突袭行动宣告以色列针对加沙的“割草” (Mowing the Grass) 政策的失败，打破了以色列军事神话，其追求绝对安全的国家安全战略遭遇重挫，以色列陷入安全困境，社会经济发展遭受重大损失。《以色列时报》援引穆迪评级机构的报告称，新一轮冲突以来，以色列的损失每天不少于 10 亿新谢克尔 (约合 2.69 亿美元)。^[1]相关报告显示，这场战争的总成本预计为 1500 亿~2000 亿新谢克尔 (约合 400 亿~540 亿美元)，相当于以色列国内生产总值的 10%。^[2]

从地区局势来看，随着冲突的持续，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整体上呈现“东和西紧”的态势，即海湾地区局势相对稳定，地中海区域战端再起，冲突升级，外溢风险上升，主要表现在以色列、美国与黎巴嫩、也门、伊拉克、叙利亚有关力量之间的冲突严重威胁地区稳定与安全。冲突还对中东地区缓和潮产生负面影响，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正常化进程“搁浅”，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关系出现全面倒退，一些国家降低了与以色列之间的外交关系等级。冲突还可能刺激中东地区新一波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但是，从整体上看，中东国家

[1] Sharon W., “War with Hamas Costs NIS 1b A Day, Hitting Economy Harder than Previous Conflicts”, November 21, 2023,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war-with-hamas-to-cost-nis-1b-a-day-hit-economy-harder-than-previous-conflicts/\[2023-12-16\]](https://www.timesofisrael.com/war-with-hamas-to-cost-nis-1b-a-day-hit-economy-harder-than-previous-conflicts/[2023-12-16]).

[2] 同[1]。

谋求战略自主、发展优先的意愿尚未因本轮冲突而改变。

2. 冲突对全球局势的影响

一方面，新一轮巴以冲突加剧了全球安全危机和安全困境，凸显了全球安全治理的紧迫性。新一轮冲突表明，巴勒斯坦问题不能无限期地拖延，必须找到解决的途径；同时，日益严重的加沙人道主义灾难，拷问人类社会的良知。围绕新一轮冲突出现的舆论战、认知战异常激烈，不少国家内部出现“亲以”和“亲巴（阿）”对垒的现象，西方国家社会撕裂加剧。国际社会的关注点逐渐转向加沙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国际社会同情加沙平民的遭遇，纷纷谴责以色列对加沙民众的集体惩罚以及对无辜平民的伤害。另一方面，冲突外溢引发红海水域航道安全，波及全球供应链安全，影响国际贸易，或将增加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可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又一个带来不确定性的源头”。受此影响，全球对乌克兰危机的关注度下降，美国等北约国家援助乌克兰的力度减弱，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乌克兰危机的走向。

另外，新一轮巴以冲突对大国的中东战略产生深远影响，打乱美国的中东战略部署，使其在中东陷入两难境地。本轮冲突使得美国推动的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进程“搁浅”，“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难以启动。冲突爆发后，美国高层多次出访中东，美国总统拜登（Joseph R. Biden）也匆匆出访以色列，其目的并非阻止加沙战火，而是展示对以色列的支持。美国又担忧局势失控，向中东派出两大作战航母战斗群，威慑黎巴嫩、叙利亚、也门等有关力量。与此同时，面对加沙地带空前的人道主义灾难，美国在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投票表决中，多次否决相关停火决议草案，站在了国际社会的对立面，其对巴以的“双重标准”遭到严厉抨击。美国可谓声誉扫地，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一直在巴以问题上秉持公平正义立场，始终站在和平、公道、国际法、大多数国家的共同愿望以及人类良知的一边，积极推动巴以问题和平解决，体现了大国担当。冲突爆发后，中国政府密集发力、紧急斡旋，推动停火止战、保护平民、缓和局势，加大协调力度，凝聚共识，从根源入手推动落实“两国方案”。中国充分发挥于2023年11月担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的作用，促成通过本轮冲突升级以来第一份安全理事会决议（即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2712号决议）。中国还积极加强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协调，发挥金砖国家组织作用，力促冲突降温。2023年11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

领导人巴以问题特别视频峰会，并发表题为《推动停火止战 实现持久和平安全》的重要讲话，^[1]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为期4天的临时停火协议，自2023年11月24日生效，随后又两次共延长3天的停火，其间以色列和哈马斯交换了部分被扣押人员。

（三）巴以冲突的前景和出路

新一轮巴以冲突已持续一段时间，加沙局势呈现极其惨烈的胶着状态。以色列军事报复行动加重加沙人道主义灾难，国际舆论对以色列谴责不断，国际社会斡旋、调停和人道救援更为紧迫。当前，首要目标是停火止战、人道救援和释放被扣押人员。接着，国际社会应再次努力推动举行中东国际和平会议，推动在“两国方案”基础上实现巴以和平。然而，巴以恢复和谈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前景不容乐观，面临重重困难。

一是，新一轮冲突造成巨大人员伤亡，进一步加深彼此敌意。这场冲突能否促使以色列反思其国家安全战略并回到“两国方案”，仍存在不确定性。而巴勒斯坦人实现内部和解已成重要前提。二是，围绕加沙重建、加沙治理安排以及谁是加沙治理的主体，仍然存在争议。以色列政府提出未来要在加沙进行安全治理、去极端化的制度性安排，不排除短期占领加沙或部分占领加沙的情形。与此同时，2024年美国将举行总统选举，美国能否施压以色列回到“两国方案”并不确定，美国的中东政策充满变数。三是，国际社会能否推动举行具有权威性的国际和平会议、重启新的和平谈判进程尚不明朗。但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如果能实现较长时间的停火，就有可能凝聚共识，新一轮巴以和谈仍值得期待。

总之，新一轮冲突使得一度被边缘化的巴以问题重回国际视野，也表明国际社会无法忽视这一中东地区根源性问题。巴以问题的症结在于巴勒斯坦人民迟迟无法实现独立建国的合法民族权利。落实“两国方案”才是破解这一“世纪难题”的根本出路，也才能给中东地区带来持久而稳固的和平前景。

关于新一轮巴以冲突的五点判断

李绍先（宁夏大学阿拉伯学院院长、教授）

巴以冲突堪称“世纪冲突”“世界难题”，具有非常复杂的根源。1991年马德

[1] 习近平：“推动停火止战 实现持久和平安全——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巴以问题特别视频峰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3年11月22日，第2版。